

参 考 信 息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5 期 (总 114 期) 2011 年 4 月 25 日

学习宣传党史 推进党的事业

编者按: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党的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一向高度重视党史研究,胡锦涛同志指出,只有对我们党“昨天”和“前天”的斗争有深切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繁重工作,勇敢地担当起明天的历史重任。深化党史研究,通过党史的研究、学习和宣传,使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刻了解我们党走过的艰辛历程,熟悉党的优良传统,汲取党的丰富经验,用党的光辉历史、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启迪后代,意义非常重大,影响非常深远。为此,我们选编部分材料,供领导和相关部门参考。

目 录

1.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1)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6)
3. 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8)
4. 党史党建基地: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研究平台……………(9)

一、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

1.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中国革命史”

1949年至1956年间,是中共执政初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定政局、恢复经济、整顿社会秩序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共和国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抗美援朝战争、“镇反”、“三反”与“五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等重大事件,如何尽快使知识群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潮流,如何对青年学生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队伍,是中共领导层时常思考的稳定政局与人心的重要一环。

中共历来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强调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以便在群众中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1948年,中共就在华北解放区成立了华北大学等一批以培养政治干部为目标的新型大学,开设了政治理论课程,目的在于给各地入学的青年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其了解中共的建国方略及各项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各行政区均设立了人民革命大学,招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破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者服务”的旧教育体系,结合老解放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特点和苏联政治教育的先进经验,教育部号召全国高校“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此同时,又强调高等教育要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相配合,“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也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因此,从1949年10月起,将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指导方针的政治化,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并彻底改造旧式教育,便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1949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规定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列为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的公共必修课。其中,“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重点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其目的是使学生从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来

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包括革命的对象、任务、活动与性质),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思想有初步了解,加强对祖国、人民、革命政党、革命领袖的热爱及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等。“新民主主义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高校开设的最早的包涵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内容的政治理论课。11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决定将华北地区大专院校开设公共理论课程的经验推向全国。

1950年上半年,在全国性的整风运动中,由于没有把握住高校聚集知识群体的特殊性,政治运动的做法与教育系统的特殊性间出现了不相适应,相继出现了一些过激问题。如沈阳农学院等校出现了领导干部间、党员与非党员间的不团结现象,没有能有效引导师生对于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讨论与思考等。7月28日,教育部下发有关高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强调在高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求“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各高校统一开设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内容均包含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内容,特别强调要结合“镇反”、“土改”和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开展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10月4日,教育部又结合全国高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指出:(1)政治理论课重点要放在“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个首要的任务”上,避免过左的情绪;(2)教师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理解中国革命史上的问题;(3)改变教学内容及安排上的混乱。教育部专门开列出了“社会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论”两门课程的讲授重点,“新民主主义论”以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为重点。这是教育部在当时师资力量较弱、政治理论学习不系统的情况下,旨在统一全国政治课教育体系的初步努力,也是“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向中国革命史倾斜的开始。

在华北地区各高校开设政治课两年后,出现了一些不重视政治课、认为“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的错误认识。1951年9月,教育部为此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的讲授中,“应着重于讲授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应尽可能地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建设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防止教条主义的倾向”。195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决定由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首批招收研究生300名,为全国各高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要求各高校选拔优秀学生党员任政治理论课助教,各大行政区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开办类似的研究班,选派有理论水平的干部进入高校任教。10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针对不同类型学校做出了系统周详的开课安排,特别规定,“新民主主义论”为一学年的课程,“在讲授‘新民主主义论’前两周或三周应增加关于‘新民主主义论教学目的’的学习,以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新民主主义论”课程在全国各高校的普遍开设,与新中国成立后三年间的各种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大学生的现实政治认识及人生观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与高中三年级开设的“共同纲领”课程和各高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内容上有重复,且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部分的充分讲授,1953年6月17日,高教部发出《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决定自1953年度起,将高校开设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律改称“中国革命史”。(通知)特别指出:改设“中国革命史”课程的目的,在于“通过五四以来的基本史实,结合列宁、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新的胜利,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领会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光荣、伟大、正确。藉以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从而提高思想与政治水平,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为自觉地积极地参加祖国建设做好思想准备。”受当时不断展开的“镇反”、“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政治气氛、国民经济恢复热潮以及“冷战”国际局势的影响,该(通知)提出:在讲授“中国革命史”课程过程中,“必须多从革命运动,对敌斗争、革命建设的历史实际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必须着重正面的系统理论的讲授,同时结合学生认识水平,解决学生的政治思想和思想方法上所存在的有关重要问题”,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讲授重点和要求。

到1956年，鉴于当时不少高校历史学专业陆续开设了“中共党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现实，为避免学生课时负担过重，9月9日，高教部对1954年出台的政治理论课程规定加以修改并出台了新的《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该《规定》指出：“中国革命史——历史系的业务课，学时由主管单位另订；其他系科，一律都开”。在二年级时开设“中国革命史”，102学时，学制1年。历史系学生则由此开始免修思想政治课体系中的历史教育课。

1949年至1956年间，正值新中国初创及经济恢复的艰难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反共反华的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政治对峙。在此背景下，强调意识形态的宣传，调动大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情绪，使之在政治上认同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具有稳定政治和国家的特殊意义。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开设，既具有宣讲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阐述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过渡特征的重要意义，又通过中国革命史及中共党史的讲解，使大学生认同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性。此后，“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演变为“中国革命史”课程，既表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性的行将结束和以中国革命史及中共党史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备受重视，也表明中国视历史教育为根本的文化传统依然延续。这一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不仅承载着向大学生群体传播和灌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的功能，也具有揭露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宣传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课程的变化，体现了时代政治需求在大学思想教育领域的深刻印记。

2.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从“社会主义教育”、“中共党史”到“语录”取代

1956年，中国宣布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当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以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却传达出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解的不同信息，在一些知识群体及高校青年学生中，开始滋生出怀疑中共领导、质疑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思潮，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并导致1957年6月爆发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受意识形态巨变的影响，原本希望通过“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使大学生群体知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必要性的宗旨，也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迅速修改为教育大学生群体如何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此发生一大转折，走上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有什么错误思想就批什么错误思想，否定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运用”，以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生产劳动为主要途径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从1957年暑假起，全国高校作为统一政治课的“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门课一律停开1年或2年，普遍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2月10日，高教部、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全体学生和研究生必须无例外地参加学习”，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其他文件。课程的学习时间暂定为一年，每周8小时(课内时间不少于4小时)，“社会科学系科可适当增加时间”。

仅仅四个月后的1958年4月12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又下发《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再次进行修改，将“社会主义教育”改称“马列主义基础”。该《意见》提出：今后“任何类型的高等学校(二年制的专修科除外)，一律开设三门政治课——‘马列主义基础’(即今天所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代替过去的‘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两门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基础”以《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为教材。教育部要求，必须“明确政治课教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克服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教学内容“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并首次提出“对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任务，毛主席的著作和国内外重大时事，应当占用政治课的正课时间及时进行教学”。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中国革命史”不到一年，又被改为“马列主义基础”，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及中共政策方针为主，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高校政治课在课程设置及内容上的这一变化，与当时中苏关系发生微妙改变、中共认为苏共正偏离正宗马列主义路线的基本认识有着密切关系。此时，教育大学生

群体避免盲从苏联道路、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正确方针、认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及以阶级斗争观点思考与分析问题，是高校政治课配合当时政治局势变化进行思想教育的重点所在，也符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必须改变政治教育中脱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脱离具体教育对象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评判学生学习成绩的时候，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的要求。

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高等教育界难免政治浪潮的席卷，为实现“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不切实际地掀起了“教育大跃进”的热潮，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自然也无法按教学安排进行。

中央九个月的初步纠“左”期间，1959年4月至7月，教育部在北京连续举办马列主义课程教师学习会，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认真读书，系统地学习理论”，并重新规定高等学校公共必修的马列主义课程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四门，“中共党史”以选读毛泽东著作作为教材。在50年代前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课程一直是重点，而“新民主主义论”及“中国革命史”的讲授，基本是以中共党史为中心展开的；此时“中共党史”课程的设置，更进一步将中共党史明确为政治理论课体系内历史教育课程的中心内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961年4月8日，教育部下发《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明确要求文理工农医各专业和艺术、体育院校都要开设“中共党史”课程。7月24日，教育部进一步提出，在统一的中共党史教材未出版前，可选读毛泽东有关著作、刘少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论著，同时可选择一本较好的党史教材作参考读物。1962年5月26日，教育部再次明确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教学提纲。

20世纪6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毛泽东针对苏联赫鲁晓夫问题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谈话，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受此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被视为“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重要环节。1964年7月10日到8月3日，中宣部、高教部与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问题，决定继续开设“中共党史”课程，明确提出：“中共党史”课程“以党的历史为线索，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使学生初步领会毛泽东同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使学生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会议所形成的《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成为此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重要方针。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一文件对政治课程功能的表述具有明显的错误倾向。

随着“左”倾思潮的继续发展，1964年后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逐渐被“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所代替，忽视了马列主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活动开始出现形式主义的倾向。“文化大革命”初期，随着个人崇拜活动日益高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革命”浪潮中被取消。以往系统、完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宗旨，被断章取义的“语录”学习“天天读”、“讲用会”所取代。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只设置了“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2年，中断6年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恢复，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课程。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政治气氛中，“中共党史”仍然沿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思路讲授、歪曲之处比比皆是。1975年起，伴随着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展开，各高校政治理论教研室被拆散，刚刚恢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课程又被取消，代之以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毛主席语录》作为学习内容。此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历史教育内容，无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要求，无视教学规律的特性，完全与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相结合。

3.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

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随着1977年高考的恢复，一大批知识青年及应届毕业生进入高校，教育发展及人才培养被视为配合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此外，这一时期对“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历史的拨乱反正工作，揭露出不少极左错误造成的恶果，引发了一部分人对于现有政治体制的反思，也导致了社会上少部分人否定中共领导、怀疑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错误思潮。

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做出了明确定位，即：“马列主义理论课是社会主义各类高等学校的必修课；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是新中国大学区别于旧中国大学，社会主义高等学校区别于资本主义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规定高等学校统一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三门课程，在文科四年级另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教育部特别指出：开设“中共党史”课程，“是为了帮助学生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学习党的传统”，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是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的历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相继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变化有以下几项：

“85方案”：主要将“中共党史”课程改为涉及内容更加宽广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形成了由“中国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体系。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指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宗旨是“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使学生了解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中国，是怎样根据历史的必然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1986年，清华大学率先试点，将“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1987年，“中国革命史”课程全面推广开来，各高校反馈的结果十分积极。“85方案”的提出，不仅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体系更加系统，感性认识与理论学习的结合更加合理，也更加符合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对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而言，这一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98方案”：经过10年的延续，面对现实社会的发展，“85方案”开始出现困境，“中国革命史”可以容纳1978年前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史，却不能容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更难以处理1978年前后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实践间的有机关系与质的区别。1987年，国家教委即决定各高校可以开设“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门课程，目的在于解决这一问题，但也出现了课时过多，各校教学体系压力过大，学生公共课负担过重的状况。教育部综合各高校意见并反复讨论后上报中央。1993年8月13日，中组部、中宣部及国家教委联合发文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中心内容”。1995年11月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规定，本科应开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史论”两门课程，对大学生进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教育。在此基础上，国家教委于1996年3月出台高校“两课”教学改革计划，要求“进一步推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课堂、进教材的工作”。1998年4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决定将原有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从秋季开始改称“邓小平理论概论”，并作为一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设，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内的“科学社会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史”中1956年后的部分，统一融合在“邓小平理论概论”中。6月10日，为总结和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验和近年来教学改革成果，中宣部、教育部又联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規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了新的普通高校本专科“两课”教学体系，即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类开设)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体系，由“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组成的思想品德课体系。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课程方面，“98方案”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主要是进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帮助学生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懂得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的规律，认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道理。由此，“中

国革命史”课程虽然取消，但新开设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与之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只是更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讲授。同时，把1956年后的内容融合到“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中进行讲授，实际上是将中国革命史与1956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区分开来。

“05方案”：2003年2月，教育部指示：从秋季学期开始，将“邓小平理论概论”课调整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几次强调加强对大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特别是强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学习的重要性。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正式确定“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名称，重新调整了四年制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后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四门必修课，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

“05方案”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增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2007年秋季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

（摘自：《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中共党史研究 2010 年第 11 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是非，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并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肯定了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发生了三件有影响的事情，揭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序幕。一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1979年宣告成立，二是《中共党史人物传》开始着手编辑出版，三是《党史研究》（后改刊名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人物》杂志相继创刊。

以上这三件事，不但在当时昭示着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春天，而且对后来30年间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

1. 1980年至1990年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方面都孕育着新的突破，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是回忆史料的整理出版。战士出版社和解放军出版社先后于1983年12月和1984年10月出版了《聂荣臻回忆录》上卷和下卷。1984年7月和1987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上卷和下卷。这两部回忆录的出版，继《星火燎原》丛书和《红旗飘飘》丛刊之后，开启了有组织、有系统地撰写回忆史料的宏伟工程。随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将帅回忆录，至今绵延不断。

其次是老一辈革命家年谱的撰写出版。1986年12月，第一部系统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生平思想的年谱问世，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王向立和力平任主编的《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又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力平和方铭任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再就是老一辈革命家传记的撰写出版。1987年，《星火燎原》编辑部推出了三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收入1955年至1965年间授衔的1613位少将以上人物的简历。1989年2月，第一部系统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生平思想的传记问世，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这部传记，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还被译成日文等在国外出版。与此同时，有关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论文、专著相继发表出版，并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方法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研讨。

2. 1991年至2000年，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经过头一个十年的探索和积累，

这十年的发展可谓成果丰硕，特色突出，并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

当代人物回忆系列。首先是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和下卷，先后在1991年和1993年问世。这部书打破了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惯例，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反思，回顾并点评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决策和事件，并对经验得失作了总结，被胡乔木誉为“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受此鼓舞和启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也于1994年出版。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在《当代中国》丛书当中，《当代人物传记丛书》占有重要位置。1991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编写组用了十年时间写成的第一部元帅传记《陈毅传》正式出版，引人注目。此后，当代中国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刘伯承传》、《徐向前传》、《罗荣桓传》、《彭德怀传》、《贺龙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等。

老一辈革命家年谱系列。这一时期，在年谱体裁上有所前进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担任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与以前几部年谱相比，这部年谱大幅度增加了篇幅，更加突出思想性和资料性，并公布了大批档案资料。1997年5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继续了这一特点。有关单位还出版了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张闻天、董必武、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人的年谱。

老一辈革命家传记系列。这一时期，继续撰写出版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1949-1976)、《刘少奇传》、《朱德传》、《任弼时传》、《张闻天传》、《王稼祥传》、《博古传》等。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系列。1993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12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热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开创了通过电视文献纪录片来塑造和宣传领袖人物的新途径。随后，1997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又一部12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首映成功。就这样，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和宣传与影视媒体结合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其他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李立三等，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此外，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综合性研究，如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与发展研究，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研究，对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关系研究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迅速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人物年鉴》诞生了。20年来，这部年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追踪记录当代各界人物为主，同时也记载和收集在中共党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有关资料。

3. 2001年到现在(2010年)，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的第三个十年。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在前两个十年取得各方面丰厚成果、全面展开的基础上，继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2003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这部厚重翔实又极富思想性的传记，反映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在经历了长期探索发展之后所达到的新水平。

贴近快速发展的时代，追踪改革开放步伐，是这一时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突出特点。2004年8月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2005年6月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的《陈云传》，2007年4月纪念叶剑英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的《叶剑英年谱》，以及2009年6月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的《李先念传》(1949-1992)，揭开了重视和加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人生平思想研究的序幕。

与此同时，记述改革开放重大历史事件和决策过程的回忆录也相继问世。如李鹏有关全国人大立法监督、经济工作、核电发展、三峡水电建设、外事工作的系列日记，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唐家璇《劲雨煦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等。2003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张震回忆录》，以及2004年出版的《刘华清回忆录》，记述了人民军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事件。

在前两个十年研究所形成的深厚积累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相继推出了几部带有总结性的工具书。2001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已经编成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精选出260多位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有较大影响的党史人物传记，编辑出版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200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2007年，出版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12卷）。

中共党史人物画传系列，也是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一个雅俗共赏的新品种。从2003年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有关单位合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画传》、《周恩来画传》、《刘少奇画传》、《朱德画传》、《邓小平画传》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宋任穷画传》等。此外，还出版了人民解放军将帅画传系列等。

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人们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既需要向前看，也需要向后看，从前人那里汲取智慧与借鉴。人们的阅读兴趣正趋向多样，文化需求正趋向多样，满足这种兴趣与需求的途径也正趋向多样。但无论如何变化，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关注与了解，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兴趣与需求亮点。这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持续地、稳定地发挥资政育人作用提供了社会舞台。中共党史人物研究需要继续紧扣时代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脉搏，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充分利用高科技带来的新平台、新手段，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优势。

（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共党史研究 2010 第 7 期）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学科初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21世纪头十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培养合格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十届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班；1956年建立中共党史系，开始招收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1961年至1966年，中共党史系还培养了5位导师制研究生。但是，那时的中共党史专业还不很成熟，研究生培养也处于起步阶段，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建设。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30多年来，中共党史学科得到长足发展。

1. 中共党史本科专业

30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本科专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到90年代的“潜伏”，再到21世纪头十年的“振兴”，经历了一个“U”字型，目前已经进入了良性发展的新阶段。学校在“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等方面，加大了对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2007年，国家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全称“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党2010年第7期史”)专业列入第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目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课程体系、配套教材和教学实践基地；能够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既能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又能从事以专业为基础的党务政务管理、文秘等实际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每年招收20名左右本科生，生源质量逐年上升，毕业生分配去向多元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一家；近年来，湘潭大学在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延安大学在政法学院中设置了中共党史系并招收本科生，井冈山大学也正在筹办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形成了“1+2”、“1+3”的中共党史本科专业格局。这些院系已经建立并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共同为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出谋划策。

2. 中共党史研究生学位点

据高校发展信息网公布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中共党史博士点19个，分别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硕士点86个，分布在全国24个省市区；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67个，中央党校和省(市)委党校14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社会科学院2个，部队院校3个。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学位点在1988年、2002年、2007年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且已成为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层次齐全的中共党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中共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学位点在2002年、2007年两次被评为重点学科。

进入新世纪后，中共党史各博士、硕士学位点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依托重点学科，多次举办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博士点导师张静如先生倡导发起了全国中共党史党建学位点建设研讨会以及博士生论坛。通过这些平台，中共党史学位点的同仁就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功能，学科发展的新领域、新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及学术规范、评价等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不少共识。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生学位点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形成了中共党史与相关学科的学科群。2004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200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实施，给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带来新的机遇。之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二级学科。据高校发展信息网公布的资料，目前，全国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编号030503)博士点46个、硕士点195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编号030506)博士点21个，硕士点94个。这些博士、硕士学位点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已有的中共党史学位点，相当一部分学位点的学术带头人原本是中共党史学位点的教授，或者是中共党史学位点培养的博士。这就形成了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三个学科“一体两翼”的学科群。探讨三者间的互补关系，确立各自的主要研究方向与重点研究领域，成为相关教授专家们共同的任务。

(摘自：《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 2010年第7期)

四、党史党建基地：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研究平台

1. 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的必要性

(1) 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是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基础工程。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包括高校党史党建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高校师生员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用，是推动师生发展和高校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又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由思想、文化、精神等表现出来的软实力。如果说自然科学表现出的科技力更多的是一种硬实力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更多的是一种软实力，它作为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是超越一切武器之上的“武力”，是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发展的战略资源。创建党史党建学科基地研究平台是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基础工程，而党史党建学科基地研究平台水平如何，是一所高校党建工作水平状态和软实力的深刻反映，更是高校党建工作综合实力竞争的焦点所在。

(2) 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是促进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引领力量。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作为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重要引领，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既有技术支撑，又有人力和智力支持，能不断回答高校党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高校党建工作创新不可多得的“信息源”、“思想库”和“智囊团”。

2. 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的基本特征

(1) 内容的时代性与丰富性。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是根据党和政府为解决党史党建学科一定历史和现实问题而设定的，因而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其内容也总是与特定的研究目的、任务和要求相协调的。同时，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门类广泛、内容丰富。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要依托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特别是其学科资源优势，结合网络时代的高校自身特点，进一步加强网络党建理论研究，深入整合高校党建的丰富信息资源，将高校网络党建工作涉及的党史党建、传播学、

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管理学以及哲学、教育、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艺术等方面的丰富理论与实践前沿知识纳入到高校网络党建工作创新内容之中。

(2) 功能的导向性。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以其鲜明的针对性和多样性,对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具体体现在价值导向、目标导向和行为导向等方面。所谓价值导向,就是以科学性、方向性和发展性为特征,使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赋予明确的意义与作用,从而达到创新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效果的目的。所谓目标导向,就是在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设置特定的党建工作创新标准,以激励和引导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发展。一般地说,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这一导向中的核心。所谓行为导向,也称人格导向,它是通过树立具有群众基础、对群众有感召力的先进楷模,使大家钦佩而在精神、心理、人格、行为等方面加以仿效。这种行为导向使目标导向具体可感,有利于促进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实效性。

(3) 对象的主体性。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活动的主体和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对象都是人,在此互动过程中,党史党建学科基地研究平台和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对象往往可以形成一种双向互补结构,共同奔向研究与工作目标,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社会责任。多年的实践证明,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可以向高校党建部门提供基础辅导、互动协调、创新导航、成果交流乃至个性化服务等协助,对于大大提高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实效性是很有帮助的。以基础辅导和个性化服务而言,就是如此。根据高校党员的学习实际,有针对性地介绍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概论、布局、项目、网上查询法、教学基地使用法、检索工具等,使党员更好地利用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平台资源;个性化服务要求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提供自动频道资源,供高校党员集体或个人自行设定个性化门户入口,进而提供个性化藏书目录、新闻订阅、新到资料通知等服务。

3. 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的主要着力点

把握要求。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促进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必须把握基本要求,并一直贯彻坚持下去。只有这样,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才能把住方向、把握规律、把好准绳,推动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步入有序运动、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来讲,一要坚持正确导向,把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建设成网络时代高校党建理论工作创新的传播点。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导向作为基本职责,贯穿于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理论工作全过程,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敏感性,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二要坚持服务大局,把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建设成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决策工作创新的咨询点。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不仅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站在学术前沿,而且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还要立足现实、面向社会,才能保持活力、发挥作用。三要坚持搭好平台,把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建设成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学科工作创新的支撑点。

突出重点。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促进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涉及的面很广,不能等量齐观、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该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具体来讲,一要加大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研究力度。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的重点研究内容。二要加大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力度。三要加大高校党员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要围绕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深入高校、深入党员群众,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研究高校党员群众利益表达、利益协调的途径和机制等问题,才能真正促进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有效展开。

优化措施。以党史党建学科基地为研究平台促进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除了要把握要求、突出重点以外,还必须善于优化措施。具体来讲,一要端正态度,努力统一对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的思想认识。二要着力提高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的科研水平,积极形成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的鲜明特色。质量是党史党建学科基地和研究成果的生命线,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不能“为学术而学术”,而应努力对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及时做出科学的理论与对策回答,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同时,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要在综合分析已有基础、特色、优势和学科发

展趋势的基础上,科学定位、快速发展,走特色鲜明的基地建设之路,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特”,为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上水平打造具有特色的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平台。三要不断增强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的创新能力,切实加强对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的科学管理。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基地要力求开门办基地、面向社会办基地,完善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人才组合灵活、利于激发基地研究人员创新能力的科研组织协调机制,推动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同时,高校要明确基地管理办法、落实基地管理责任。

(摘自:《利用党史党建基地:网络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研究平台》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